

一、前言

「跨領域」研究對社會理論的研究工作有沒有幫助？答案似乎顯而易見。難道社會理論不是一直試圖吸收各種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精華嗎？這不就是狹義的「社會學理論」（以那些學界公認為「社會學家」的著作為核心的理論）和廣義的「社會理論」的區別嗎？任何一本比較深入的社會理論著作，都可以看到各種與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有關的跨領域研究成果（見如 Callinicos 2007; Outhwaite 2015）。換言之，嚴肅的社會理論工作必然以心胸開闊的跨領域研究為前提。

但人文社會科學「以外」的學術領域呢？似乎也是如此。正如 Chapman(2010: xiii)所言，既然我們的社會生活是複雜的，社會理論也必然是複雜的。但「複雜性」恰恰是自然與生命科學長久以來面臨的難題，也是晚近所謂「複雜科學」(complexity science)的核心(Waldrop 1992/1996)。在處理複雜性的問題上，已有部分社會理論家試圖運用複雜（系統）科學的某些概念（如系統、突現、混沌、臨界現象、碎形、自組織等）來處理社會複雜性的問題（見如 Wan 2011 與 Niklas Luhmann 的對話）(Byrne and Callaghan 2014; Castellani and Hafferty 2009)。此外，也已有部分社會科學家積極與演化生物學對話，為社會科學尋找演化的基礎（綜合評述見 O'Malley 2007；中文世界的嘗試可參考萬毓澤 2015），力倡「將社會科學本身統一在某種廣泛的社會文化演化架構之下」(Blute 2010: 7)。晚近的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演化發育生物學(Evo-Devo)、發展系統理論(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y)等領域的快速發展，也大幅拓展了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對話空間。除了這些既有的成果外，本研究希望從分析社會學(analytical sociology)的視角出發，進一步探討認知神經科學等學科可能對社會理論工作帶來哪些啟發。

認知社會學(cognitive sociology)學者 Cerulo(2010)指出，過去 50 年來，認知神經科學已逐漸成爲研究思想、認知與文化的權威學術領域，而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正積極與認知神經科學對話，不希望在對人類行爲的研究進展中落於人後。可惜的是，部分社會學者仍固守學科邊界，對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跨領域研究視而不見。社會理論工作者雖然少有例外，但晚近確實有所突破，值得關注。

不論認知神經科學或(演化)生物學，當然都不是同質的研究領域，而是流派分歧、爭議繁多。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於對這些學術領域內部的爭議採取特定立場，而是將焦點擺在：社會理論可能從跨領域研究的發展中汲取哪些資源，以豐富、深化或檢討自己的工作。我將從三個相互關聯的面向來闡述這個問題：(一)以晚近關於「社會突現」(social emergence)的研究爲例，說明(受認知神經科學影響的)心靈哲學如何幫助社會理論工作者處理涂爾幹以降的重大問題：個人與社會、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社會複雜性與化約的關係；(二)說明認知神經科學如何爲社會理論的重要理論概念或因果解釋提供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s)，從而有助於支持、擴充、修正或拒絕這些概念與解釋；(三)以晚近關於「強相互性」(strong reciprocity)的研究爲例，說明認知神經科學、實驗經濟學、人類學、演化生物學、社會心理學、倫理學正如何合作，探討社會理論歷久不衰的核心問題，即 Talcott Parsons 所謂的「霍布斯式(社會)秩序問題」。

這三個面向不是隨機挑選的，而是爲了勾勒出某種「分析社會學」(analytical sociology)視野下的理論工作樣貌。前兩個面向，涵蓋了分析社會學嘗試處理的兩大課題，即「(社會)突現與化約的關係」及「因果解釋的微觀基礎」；第三個面向，則是說明當前的跨領域研究如何爲「強相互性」提供了微觀基礎，從而有助於解答社會理論的核心關懷，即社會秩序問題。